

屈原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

QU YUAN

A SERIES OF GUIDE BOOKS TO
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

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

屈 原

郭 维 森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屈子行吟图

——〔明〕陈洪绶作

東君



东 君

——〔清〕萧云从作

目 次

一、诗人的降生和家世	1
二、诗人的时代	5
三、悲剧的一生	15
四、辉煌的诗篇	28
(一) 关于“楚辞”	28
(二) 离 骚	33
(三) 九 歌	56
(四) 天 问	66
(五) 九 章	70
(六) 招 魂	82
五、巨大的影响	86
(一) 屈原之后的“楚辞”作品	86
(二) 哺育了各个时代的作家	92
(三) 研究屈原的著作	93
(四) 永久的纪念	97

一、诗人的降生和家世

辰阳山中，湘江泽畔，一位容颜枯槁的老人徘徊着，吟诵着。他满腔悲愤，昂首问天，高高的苍天不作回答；低头问地，沉沉的大地静默无语。他的诗篇控诉了自身遭遇的不平，表达了对于善与美的向往和对于恶与丑的憎恶。在当时的形势下，他既无力驱除黑暗，又不愿同流合污、苟且偷生。痛苦和失望逼得他终于投进了清冷的汨罗江中。

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，就是这样以自己的生命熔铸成不朽的诗篇，昭示了光明的理想。

这位诗人在二千三百多年前的战国时代，出生于江汉流域的楚国。他的名字叫做屈原。

据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记载，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，和楚王同姓^①。他的祖先屈瑕，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，被封在“屈”这个地方，后代就以屈为氏。所以从家世渊源来讲，屈原和楚王同一始祖，这个始祖就是传说中的古帝颛顼〔zhuān xù 专序〕高阳氏。

屈瑕曾作过莫敖，他的后人屈重、屈到、屈建等，

^① 楚国本来姓芈〔mǐ 米〕，楚王鬻熊之后以熊为氏。屈原与楚王同祖，也应姓芈，屈是氏称。后来姓氏不分，故说屈原姓屈。

也都作过莫敖。莫敖是楚国特有的官职，从屈瑕的事迹来看，又办外交，又带兵打仗，位置是很高的。屈氏祖先中还有个有名人物叫屈完，在齐桓公统率诸侯伐楚时，曾前往召陵（今河南鄆城县东南）议和（公元前656年），办了一件出色的外交。《左传》上有这样一段记载：齐桓公约屈完同乘兵车检阅诸侯的军队，威胁他说：“用这样的军队去打仗，谁能抵挡；用这样的军队去攻城，有什么城攻不破。”屈完却回答说：“大王如果用德义来联合诸侯，就没有人敢不服从；如果要用武力，那么，我们楚国便把方城山作城墙、汉水作濠沟，你的兵再多也没有用处。”这几句话讲得有理有节、不卑不亢。这样来应对诸侯，可说是善于辞令的了。

战国时代，屈氏势力较弱，比较著名的人物有被秦国俘虏了的大将军屈匄（gài 丐），再就是屈原了。《惜诵》里有“忽忘身之贱贫”的话，可见屈原虽还保持着贵族身份，但在经济地位上已开始没落。

屈原的贵族出身，使他有可能会受到教育，掌握了较丰富的文化知识，为他的诗歌创作准备了条件。同时由于他和楚王同姓的关系，就培养了他较浓厚的宗国感情，在《离骚》一开头，他就说明自己是古帝高阳氏的后代，特别抬出这位传说中统治整个天下的始祖来，未始不是一种宗国的自豪感和由楚国统一天下的愿望的表现。

屈原的家乡是在今湖北省秭归县。据古书记载，

那里有好些关于屈原的古迹。秭归在三峡附近，三峡是著名的风景奇秀的地方，酈道元《水经注》曾这样描写三峡的风景：“在三峡七百里中，两岸山连着山，没有断缺的地方。一座座山峰相重迭，遮蔽了太阳和青天，不是正中午或正半夜，就看不见日月。……断崖绝壁上生着些怪柏树，悬泉瀑布在其间飞泻。……每逢初晴的天气或降霜的早晨，萧瑟的寒气笼罩着泉林，便常有猿猴发出长啸，此起彼伏，声音凄厉得很，而空谷回声，使这哀啸声久久的不能停息。”奇幻的风景再结合了美丽的神话，会对诗人的丰富的想象力发生一定的影响。

从《屈原贾生列传》中，我们知道屈原生活的主要时期是在楚怀王(公元前328—前299年)和楚顷襄王(公元前298—前263年)的时代。按照《离骚》“摄提贞于孟陬〔zōu 邹〕兮，惟庚寅吾以降”两句话推算，一般都以为他的生年当在公元前343年至前339年这几年中某一年的正月庚寅日^①。非常凑巧，屈原的生日是寅年寅月寅日，照当时流行的说法“人生于寅”，屈原的生日正合着“人”的生日。因此，他的父亲(号叫伯庸)就替他取下了很好的名字。《离骚》中说：“皇(皇考)览揆余于初度(生日)兮，肇(始)锡

^① 中国古代天文家，分周天为十二方位(子、丑、寅、卯……)看每年太岁星(木星)所在方位定以专名，如困敦、赤奋若、摄提格……；摄提是摄提格的简称，便是太岁星在寅位的一种天象，古人用以纪年。又，屈原生日的推算，因为计算的方法不同，所以有几年的差异。

(赐)余以嘉名；名余曰正则兮，字余曰灵均。”“正则”是平正可为法则的意思，“灵均(韵)”是神田的意思。在这里，屈原分别解释了他名平字原的含义，目的在于说明自己有美好的禀赋——“内美”，同时也说明自己的品质正如他父亲所期望的，既正直而又聪明。

屈原相信自己有很好的禀赋。为了不辜负这种美好的禀赋，他在少年时代便努力学习，培养了卓越的才能。诗人立志要做一个正直有用的人，做一个完美的人，而在整个一生中，他也是毫不动摇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。

二、诗人的时代

屈原生活在战国(公元前475—前221年)中期。根据我国史学界的一般看法,战国时期我国由奴隶制社会跨进了封建制社会。

春秋(公元前770—前476年)以来,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。在奴隶不断地暴动、逃亡以及平民起义浪潮的冲击下,奴隶制度再也维持不下去了。各诸侯国或迟或早地进行了政治、经济制度的改革。如公元前594年鲁国“初税亩”(开始按田亩收税),承认了私有土地的合法性,这就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,确认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存在,标志着在奴隶制度的母体中新的封建制度已孕育成熟。春秋时期,各诸侯国内新旧势力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。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卿、大夫经过长期斗争,逐步取代了代表奴隶主的公室的权力。战国时期,齐国的田氏取代了姜姓,正式列为诸侯;晋国则被分裂为韩、赵、魏三个诸侯国。封建制的政权陆续建立起来。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不断进行战争,几个大国在争做霸主的同时,对周围的小国不断进行兼并。到了战国时代,原先的几百个小国并成了七个大国以及

居于附庸地位的十几个小国。这七个大国是：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秦。七国间连年进行战争，战争的规模远远超过春秋时代，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战国。这时，作为奴隶制度象征的“天下共主”的周王室已被彻底摒弃，周只是作为一个附庸小国而存在着。所以七国战争的目的已不是争做霸主，而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封建政权。一个统一的中国的出现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

尽管战国时期主要大国都实行了封建制，但各国内部的斗争并未停止，旧贵族总是竭力反对彻底的改革，他们为了保住眼前的私利，竭力破坏富国强兵的措施，阻挠社会的发展、进步；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力量则要求打击捣乱破坏的旧贵族，迅猛地发展封建制度，进而实现全中国的统一。对于各国来说，进步力量和腐朽力量斗争的胜败，改革是否彻底，就最终地决定了它们的命运。

战国时期，七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，各国的力量消长变化很大，斗争形势也显得十分错综复杂。初期，韩、赵、魏都曾强盛一时，尤其是魏国，魏文侯时任用李悝〔kuī 亏〕、乐〔yuè 悦〕羊、西门豹、吴起等人，实行了经济、政治制度的改革，成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。后来，这三国由于改革未能贯彻到底，再加上所处地势不利，战争频繁，在秦国的不断攻伐下，便逐渐衰弱下去。燕国僻处北方，所受战祸较小，致力于开拓东北的疆域。齐国由于历史悠久，文化较

高，一直保持着东方大国的地位。楚国从春秋以来就是南方的霸主，它的疆域广大，人口众多，到了战国时代，经济、文化都发展到相当的高度，但是政治制度却比较落后，政权操纵在腐朽的旧贵族手中。秦国本来兴起较晚，可是由于在秦孝公时代（公元前361—前338年）实行了商鞅的比较彻底的变法，日益发展为最强大的国家，在战国的后半期，连年攻击各国，成为其他六国的严重威胁。

处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山东六国^①感到有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秦国的必要，于是就有一批策士出来提倡合纵的主张。所谓合纵，就是从燕到楚，南北合成一条直线，共同反对西方的秦国。主张合纵的最著名人物有苏秦。为了对付合纵，秦国也利用一批策士定出了连横的办法，就是同六国中的某一国结成联盟，连成一条横线，攻击其他各国。主张连横最著名的人物是张仪。战国后期，七国之间的斗争，主要便是合纵与连横这两派的斗争，斗争的结果往往是连横派得胜。山东六国彼此利害冲突，根本无法结成巩固的联盟，而且各国的统治集团大多目光短浅、苟且偷安，经不起秦国的威迫利诱，后来秦国采取“远交近攻”的办法，就更有效的摧毁了合纵阵线。

当时最有条件统一中国的是秦国和楚国，楚国就成了秦国进攻的主要对象。在秦国占优势的情况

① 六国都在崤山以东，所以历史上习惯称为山东六国。

下，楚国只有和齐国结成联盟才能和秦国相对抗。

外交上的斗争还是次要的，秦楚成败的关键是国内政治制度的改革。

秦国是在实行了商鞅的变法之后才更加强大起来的。公元前 359 年和公元前 350 年商鞅在秦实行了两次变法。他变法的主要内容有：(1) 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度，根据军功制定尊卑爵秩的等级；(2) 废除土地国有的井田制，承认土地私有，允许买卖土地，并一律征税；(3) “重农抑商”，奖励耕织，扩大耕地面积；(4) 划一“度量衡”；(5) 实行五家为伍，十家为什的编户制，实行“连坐告奸”的法令；(6) 将秦国的乡里邑聚统一规划为三十一县。商鞅的变法实行了封建土地所有制，取消了旧贵族的特权，以地主政权代替了奴隶主政权，就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来说，这是进步的；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，为了巩固封建秩序，新兴地主阶级也加强了对农民的限制与压迫。秦国采用了商鞅变法的措施后，生产力大大发展了，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了，一跃成为第一等的强国。早在秦国变法以前，楚国在悼王时期（公元前 401—前 381 年），任用由魏入楚的吴起，也曾实行过变法。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有：(1) 取消旧贵族的特权：凡封君的子孙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，疏远的公族不再算做公族；(2) 强令旧贵族“实广虚之地”，迁到荒僻的地方去垦荒；(3) 废除无关紧要的官职，裁减无能的官吏，削减官吏的俸禄，用以抚养战士；(4) 选练士

卒，改变郢（yǐng 影）都“两版垣”（版筑）的建筑方法。吴起的变法如果能够实行，楚国就有可能更加强盛起来统一中国。可惜变法没有多久，楚悼王死去，吴起被旧贵族射死，变法遭到挫折，变法的影响也逐渐消失。到了楚怀王时代，楚国的政治依旧十分腐败。苏秦曾对楚王形容这种腐败的情形说：“如今大王的大臣和亲戚们，喜欢伤害贤能的人来培植自己的势力，拚命搜括老百姓，使得大王遭到人民的痛恨。”这种情形，和屈原在诗篇中揭露的完全一样，而发展下去的结果必然是：“……群臣相互妒嫉功劳，阿谀拍马的小人当权，忠良之臣却被排斥。百姓离心离德，城墙濠沟也不修整。既没有良臣，又没有防御设施。”^①把楚国搞得日益衰弱。在秦国的攻击下，楚国一再迁都，公元前 278 年迁都到陈（今河南淮阳县），公元前 241 年迁都到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，最后终于在公元前 223 年为秦所兼并。

战国时代，由于经济制度、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，在思想界便呈现了百家争鸣的活跃气象。那个时代“士”这个阶层非常活跃。在奴隶社会中，掌握知识、文化是奴隶主的特权，即所谓“学在官府”。春秋以来，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，奴隶主垄断文化的情况也被打破了，作为知识分子的“士”（武士、侠士除外），成了文化的传播者。新兴地主阶级为夺取思想、

① 这是秦将白起攻下郢都后，分析楚国失败原因的话。

文化的统治权，十分重视“士”的作用，对他们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。于是私家讲学的风气兴盛起来，称为显学的儒家和墨家都训练、培养了大批的“士”，在政治上、文化上起着很大的作用。战国时期，“士”的作用更大了。据说，孟子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，以传食于诸侯”。有几百个追随者，可见他有不小的势力。取代了奴隶主政权的封建统治者，由于政治上的需要，对“士”特别尊重，不遗余力地延揽他们，供养他们。如魏文侯、燕昭王都以“礼贤下士”著名。而齐威王、齐宣王则在齐都临淄的稷下，造了高堂大屋，召集众多学者，授以列大夫称号，让他们不治而议论，造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文化中心。战国后期，“士”的流派混杂，所起的作用也很不相同，大致学术之士主要授徒讲学，著书立说，在互相辩诘中建立学派，发展学术思想。而策士即所谓纵横家，则奔走于各国之间，干预各国政治，以求富贵。战国时主要的学术派别有：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阴阳家、名家等六家，其中的代表人物有：墨翟、孟轲、李耳、庄周、荀卿、韩非、公孙龙、惠施、邹衍等。这些学者从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出发，就当时的政治、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。他们或者为封建社会鸣锣开道，编造关于地主阶级自身的幻想；或者为奴隶社会大唱挽歌，并且站在没落的奴隶主立场上大揭地主阶级固有的疮疤。这些学者提出了种种治国的计划，多数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治制度和秩序的，但也有一

些则企图开历史倒车，宣传奴隶制时代甚至原始社会的“光明”。各派学者在哲学思想方面则展开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，辩证法与形而上学、诡辩术的斗争，这些斗争主要表现在对客观世界的不同的解释、不同的观念上面。这些政治家、思想家的著作和一些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，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等，大都是用艺术性较强的散文写出来的。他们往往运用神话传说、历史故事，或自己编造的故事来说明道理。他们写文章较多运用当时的口语，采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，以求达到宣传的效果。

各个学派的斗争，推动了不同地区文化思想的交流，对促进统一，建立高度发展的华夏（中华民族）文化，有很大的关系。

这里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既然屈原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时代，那么，他的思想属于哪一家呢？先前较普遍的说法是属于儒家，后来也有主张属于法家的。这两种说法都有一些根据，但也都不能成立。说屈原是儒家，主要的根据是屈原诗中称道尧、舜、禹、汤，还有“论道”“服义”之类儒家常用的语言。可是，从另一方面看，屈原完全摒弃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，而且“放言无忌”，大胆驰骋想象，“怪、力、乱、神”无不涉及，这些是儒家想也不敢想的。古代批评屈原的人，也都指出他诗篇的许多内容“异乎经典”，而且他“露才扬己”“责数怀王”，很不懂得“中庸之道”。所以，说屈原属于儒家，是不能令人信服的。

认为屈原是法家，主要的根据是屈原曾造作宪令，诗篇中又有“国富强而法立”之类的句子。诚然，屈原既要改革内政，必然主张明法审令，因而和法家的主张比较接近。但就其整个思想来看，与绝对讲求功利、刻深峻急的法家，毕竟又有很大的距离。法家主张文化专制，钳制人民的思想，一般说是反对文艺的，更不允许对君主加以指摘，而屈原则是思想活跃，“放情肆志”。所以将楚辞的作者说成是法家，也并不恰当。

先秦诸子书中都没有提到屈原，记述战国时纵横家活动的《战国策》一书中也没有他的名字。记载诸子百家、分别其流派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并未将屈原归入某一流派，而是将他列为诗赋的第一个作者。在《汉书》作者班固之前，贾谊、司马迁都赞扬屈原是一位光明磊落的爱国诗人，而没有提到他属于某一学派。可见，屈原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，对于各家学派，他有所采取也有所摒弃。总的说来，他留给后世的不是政治、学术性的散文，而是感情激荡的诗篇。所以，恰当的办法是突出其诗人的地位，而不必勉强判定他属于何种学派。

屈原的诗歌创作和先秦散文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两者是同时代的产物，都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，思想界非常活跃的情况下产生的。屈原的诗篇规模如此宏大，内容如此丰富，和先秦散文可谓旗鼓相当。这是因为两者都吸收了历史文化的精华和民间文学的